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

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一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书五经 / 秦川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402 - 1884 - 3

I. 四... II. 秦... III. ①四书②五经 IV.
B222. 1 Z1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418 号

四书五经

主编: 秦川

责任编辑: 张增光

总策划: 三读国学馆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 100006

电话传真: 86 - 10 - 82565858 (发行部)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586 千字

印张: 136.75 印张

印数: 0001 - 3000 册

版别: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2 - 1884 - 3

定价: 995 元 (全 4 卷)

ISBN 978-7-5402-1884-3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出版说明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本来还有一本《乐经》,后来亡于秦火,只剩下五经。

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宋朝以后的科举选仕,试卷命题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四书五经的提法现代人都已经非常熟悉,其实四书和五经并不是同时的。五经早在秦汉时已经具备了经典的地位,四书则是南宋学者朱熹的发明。这位儒学大师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倾力撰著了《四书章句集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注,造就了四书的时代。宋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四书已有凌驾于五经之上的地位。可以说,宋朝以后是四书的时代。

五经的时代则属于汉唐。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失传,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加上了《论语》、《孝经》,是为七经;唐时又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再加《孟子》,成为十三经。“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而现在为人熟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

以下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儒家经典:

《大学》本是《礼记》的一篇,作者不详,相传是孔门弟子曾参与其门人弟子所作。

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大概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程颐还和其兄程颢一起对《大学》进行了重新整理，并改变了原文的章次，将其分为“经”、“传”两部分。这一思路被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所接受，朱熹还对“经”、“传”的作者进行了推测，认为“经”是曾参记录孔子的话，而“传”则是曾参的门人弟子记录曾参的话。这一师承授受关系，其实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平心而论，只是宋儒为了强调《大学》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而为之张本的手段而已，正如把《周易》中的易传部分的著作权归到孔子名下一样。但是，后人也并没有将此观点完全否定的强有力证据。清朝著名学者戴震幼时读书，曾就此提出疑问：从曾参到程颐有一千多年，其间，《大学》的作者一直未有归属，程颐怎么知道是曾参所作呢？从情理上讲，这一怀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持它，但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来反对它。所以，关于《大学》的作者，我们只需要知道上面所说这些，理解宋儒的用心即可。

关于《大学》的主旨，郑玄认为“大学者，以其纪博学可以为政也”。孔颖达进一步阐述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韩愈、李翱等人开始对它有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它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到了宋代，这一认识得以加强，《大学》有了从《礼记》中抽出得以单行的资格。二程对《大学》倍加推崇，朱熹承之，作《大学章句》，开篇即曰：“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也就是说，朱熹和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朱熹的《大学章句》，后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一并刊行，名为《四书章句集注》，元朝廷祐年间，朝廷把《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文本。从此，《四书章句集注》便成为读书人进德修业的必读书。

由此，《大学》的版本也就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包括在《礼记》中的注疏本，二是宋儒改编后单行的章句本。

《大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些易懂，有些费解，但所阐述的，主要是道德修养与社会的关系，认为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社会的治乱。这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的总纲，就是开篇被宋儒定为“经”的部分，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开始，又以“明明德”为重中之重。什么是“明德”，众说纷纭，朱熹用孟子的性善来解释，认为“明德”是人们天赋的善良美德，而要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扬自

己天赋的善良美德,就需要“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由外至内,层层深入。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内至外,水到渠成。将道德修养的作用强调到了极致。

总纲之下,被宋儒整理为十章,也就是被认为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的“传”,十章文字逐一解释“经”提到的内容。朱熹还总结道:“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朱熹对于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自少至老,用功数十年,尽管他是为了阐明所谓“大义”,但这种认真、持续的学习态度对今人还是有启发和示范意义的。

《中庸》本是《礼记》的一篇,和同书中的《大学》一篇命运相似,到了宋代被抽出单行,并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

和《大学》的作者难定确属不同,《中庸》的作者早在西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中《孔子世家》一篇,已定为子思。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司马迁《史记》历来被人奉为信史,司马迁为著书又注重实地调查,他曾到过孔子故乡山东曲阜,故而《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说法很少遭到反对,《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注疏》,同样认为《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也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不过,还应当注意的是,《中庸》的著作权归属虽没有什么争议,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文本,字字皆出自子思。它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秦汉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对此,学者已有论述。如《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话语中事先肯定人性本善,较之讲性善的孟子更进一步,按理应在孟子(只说有善的萌芽)之后。再如第二十八章,介绍当时情况时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这种状况只有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能出现,明显有后世因素的闯入。

“中庸”二字出自《论语·雍也》,是孔子理想的道德最高境界,“中庸”之名,郑玄释为“记中和之用也”,把“庸”解释成“用”,朱熹引二程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把“中”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把“庸”释为“平常”。并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主要发挥了孔子“中庸”的思想,它讲述儒家关于修身、治国、处世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思想,要求人们按照这些道德规范和原则,调节个人的思想和言行,做到不偏不颇,无过无不及,即所谓“中庸”之道。同时,它还要求人们以至诚的态度不断进行道德修养,积累学问,以达到自我完善的精神境界。当然,应当指出,这些处理社会矛盾、协调人际关系、加强自我修养等方面的知识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尽管朱熹将《中庸》捧到“孔门传授心法”的至高地位,并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但是,《中庸》有些观念还是与孔子的思想有相当距离。有学者指出,《中庸》与主要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事鬼,体现出鲜明的现世色彩,而《中庸》却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难怪人们认为就强调鬼神这一点而言,《中庸》的思想不是较《论语》进步,而是后退了。再有,《中庸》非常强调“诚”的作用,可以视为是其基本观念,而这一点,并不为孔子看中,“诚”字在《论语》中仅两见,还有一处是引《诗》,并无实义。由此可见,朱熹对《中庸》的强调有些过了头,这与其意在阐明圣人(孔子)之学的立场有关,是时代之必然,也无可厚非。

《中庸》原本仅一章,朱熹《中庸章句》将之析为三十三章,经过这一分章,可以把“孔门传授心法”条理清晰地展示出来了。朱熹之学之所以在其后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推崇,得到广大读书人的追随和学习,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批判地吸收《中庸》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对朱熹这种锲而不舍、常学常新的学习钻研精神,也应该给我们今天的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借鉴。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记述孔子言论行事及其少数弟子的言论行事。“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言语的意思;《论语》的命名,就是指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其中主要是辑录孔子的言论和行事,是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本源的重要资料。

《论语》又简称《论》,或《语》。在战国和汉初流传时,并不是“经”,是当作附在“经”后的“传”或“记”的;不过,在所有的“传”、“记”中是最重要的“传”或“记”。从战国年间开始,儒家学派办学,一直当作重要的教材。学童经过启蒙识字教育之后,不读五经先必读《论语》,这一教学程序,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汉代把孔子抬到崇高的神圣地位,辑录孔子言论和行事的《论语》,也便定为经书,以后一直是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一。宋朝的朱熹又把《论语》和《孟子》、《大学》、

《中庸》合编为“四书”，明、清两代是科举用书，每个读书人都必须背熟，所以它是封建社会人人必读的书。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幼年时家境已经衰微，青年时代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畜牧管理员)之类小吏。他聪敏好学，志向远大，喜好古代文献，学识渊博，名冠乡里。中年开始授徒讲学，闻名鲁国；曾出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摄行相事三个月。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奴隶制向封建制激烈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提出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鲁国当政者不能接受，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学说。他走遍了大小国家，没有一个国君采纳他的主张。他到处碰壁，晚年返回鲁国，以整理文献、教授学生终其一生。

孔子伟大的贡献，是他搜集整理了大量古代文献，使之得以流传和保存下来；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学，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创始的历史上最大的学派儒家学派，继承、改造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从汉代开始，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圣人”、“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他被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现存20篇，470余章，其中大部分是孔子的言论和行事，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学生记录的。这些章节最初记录的时间，是在春秋末年孔子生前或死后不久。

杨伯峻推定《论语》成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基本可信。可以认定《论语》是在战国初期由曾参的门人编纂的。

《论语》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讲仁、义、礼、智、信，讲温、良、恭、俭、让，要恢复周礼，施行仁政，在当时动荡的时代显然不合时宜，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学说里，有对理想君主与仁政的美好设计，有对社会结构与伦理关系的合理规划，有对个人修养与人生境界的理想评估，有对平民生活与痛疾苦恼的热情关怀。他的理想的主体与他为之奋斗不懈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其实是人类人性与基本道德、政治、文化内涵的一种表现。那种悲天悯人，那种自我牺牲都闪亮着人性、人心的光辉，经过时间的磨洗，人们从思想、心灵、灵魂上一步步与之认同，所以孔子不仅成为儒家的代表，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当孔子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无法实施自己的理想时，他找到了有着更深远意义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具备受教育的权利，而孔

子则兴办私学,将教育从官府引向民间,那个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而其中有3000人就是孔子的学生,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堪称各国的精英,其中最优秀的有72位,可见当时孔子兴办教育功德无量。他在教学中积累的许多原则和方法至今仍被教育家们奉为圭臬。

《论语》一书内容非常丰富,给予后人后世的影响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孔子强调礼制的政治主张。在孔子的礼治思想中,以君权神授为中心的宗教神秘色彩被大大淡化,繁缛的仪式不再被突出,而规范各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调适人际关系,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则成为问题的关键。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本来相近,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不同,人与人之间才形成差异。教育和学习十分重要。他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倡导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留下了许多有益于学习的格言,因而成为万世师表。

(三)构建君子的人格风范。在孔子那里,人被分成圣人、君子、仁者、智者、贤者、直者、善人、小人、鄙夫等类型。其中的君子,凝集着许多美德,而又不像圣人那样高不可攀,最为孔子师生所乐道。这种君子的人格风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促使人自律、催人进取,甚至不惜杀身取义。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四)“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孔子明确意识到较之虚无缥缈的鬼神世界,现实世界更为实在,更为重要。一个人应当看重生前而勿论死后,一个政治家应当注意人事而回避鬼神之事。这种明智的现实主义态度,历来为士大夫中的有见识者所欣赏、继承,成为抗拒、排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支柱。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论语》的版本情况大致如下: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本,并加以注释。郑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逐渐亡佚。以后各代对《论语》多有注释,著名的有:三国时魏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也相当出色。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书中是战国时期孟轲与其弟子和同

时代人的谈话记录。全书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为七篇十四卷，相传至今。

在战国时期，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各学派之中最大学派的代表，自称是孔子的嫡派，在当时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孟子》一书被列为诸子之冠。孟子一生致力于发展孔子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在封建时代被尊为“亚圣”，《孟子》也就成了“圣经”。在汉代，《孟子》和《论语》都被当作重要的“传记”，一度立《孟子》博士，有章句流传。《孟子》特别受到推崇，是唐代韩愈提倡复兴儒学，表彰孟子是孔子“道统”的唯一继承者。宋代儒家学者或发挥孟子的政治学说，或发挥孟子的哲学学说，以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他们都推崇《孟子》一书，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确定为儒家的正式经典。朱熹又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

孟子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在战国时期，儒家，是受孔门之学的人的统称。孔子死后，其弟子多人传授孔门之学，所以儒家化分为八派，其中子思学派是孔子嫡传的一派，影响也较大。孟子思想与子思学派同出一脉，世称思孟学派。子思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孟子，孟子成为思孟学派的最大代表，后来又简称孟子学派。所以，可以说孟子是儒家正统学派的继承人。

孟子名轲，表字无传，约生卒于公元前372年—前289年，或公元前385年—前304年。孟轲是鲁贵族孟孙氏之后。孟孙、叔孙、季孙三氏同为鲁桓公之庶子，称三桓。春秋以后，三桓子孙衰微，孟轲的祖上由鲁迁邹（今山东省邹县），孟子即为邹人。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败。孟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从子思的再传弟子受业，师承儒家正统学派。他先学习，后教书，中年以后游历各国时，已经很有名气，就其本人的身份而言，他属于战国时期的“士”这个阶层中的上层分子，即知识分子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孟子以儒学大师的身份，在中年之后，游历各国近20年。到处都是由国王以礼相待，却无人实行他的政治理论。65岁后，孟子回到老家，以孔子为榜样，从事教学与著述，84岁卒。

《孟子》思想的基石是孟子对人的本性问题进行思考而提出的性善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为人所固有；将性善论推广到政治实践中，告诫君主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实行仁政，就能保民而王。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他力倡的“浩然之气”，树立的理想人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育了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对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明清之际启

蒙思想家和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回响,为其承继改铸,重放异彩。

孟子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仁”的学说体系。孟子的“性善论”、“良贵”说使“仁”的学说在理论上更臻完善。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仁”的学说延伸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使之体系化。

孟子是中国古代最富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他尊重人民的意见,关心人民的疾苦,视民心的背向为政治成败的关键。而“民贵君轻”说集中表述了孟子思想中的民主精华。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孟子重视道德,更重视道德“教化”。所谓“教化”就是教而化之,使人的道德提升到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

中国古代重视人的精神境界,这与孟子的提倡是不可分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尚公的精神境界。第二,“浩然之气”、“舍生而取义”的人生境界。第三,“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精神境界。

此外,孟子的“天道观”和认识论都是自成体系,有相当价值的。

《孟子》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又在文学上有较高的地位。孟子的文章,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强烈,是先秦散文的杰出代表,在诸子百家中,《孟子》文章的流畅犀利、气势磅礴,与《庄子》文章的恢弘谲怪、汪洋恣肆,堪称先秦哲学散文中的双璧,它给了后世散文家以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汉代的司马迁,到唐代的韩愈,乃至宋代的欧、苏、王、曾,无不推重,并悬之为学习古文的典范。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其基本内容是有关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及君臣的谈话记录。是我国流传至今的最为古老的典籍。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是封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它对封建时代乃至今天的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极其深刻而广远。

所谓“尚书”,即“上古之书”之意。《尚书》最早称《书》,汉代才叫《尚书》。今存《尚书》共五十八篇,按朝代而分《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

《尚书》在先秦时代大约已有定本。但书成何时,何人所编,由于资料缺乏,已难考证。汉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乃孔丘编纂。但这种说法自宋代以来即遭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些篇章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不会是出自孔子一人之手。

《尚书》在汉代形成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今文,一种是古文。由此,《尚书》的研究有

今文学派、古文学派之别。在汉代,流行最早的是伏胜所传的今文尚书。伏胜,史籍多称“伏生”,“生”乃古代对读书人的尊称。《史记·儒林传》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据载伏生曾任秦时博士,伏氏《尚书》为秦王朝官方定本。伏生采用通行当时的隶书讲授,故称今文《尚书》,亦称“伏生本”。另一版本《尚书》是所谓古文本《尚书》。《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他所读古文《尚书》究竟来自何处,《史记》并无交代。但据西汉末年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所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这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因为是在孔宅墙壁中所发现,故又叫孔壁本,或壁中本。据孔安国研究发现,古文《尚书》中有二十九篇与今文尚书即“伏生本”基本相同,至于那多出的十六篇是否是流传过程中所散佚的,则尚无定论。

《尚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今文《尚书》虽仅 28 篇,但它却涉及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代秦穆公的历史。虞书反映的是尧舜时代的历史。《尧典》中关于尧舜事迹的记载,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皋陶谟》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治国的方略,它对研究尧舜社会历史,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夏书中的《禹贡》《甘誓》分别反映了夏朝两件大事:大禹治水和夏王伐有扈,对研究我国远古时代农业生产、地理物产及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文献依据。商书记载了商王朝的建立、盘庚迁都、中兴及衰亡,是研究殷商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周书大部分是西周初期的历史记录,反映了周王朝由建立而巩固而兴盛的全过程。

《周易》,简称《易》,是一部卜筮之书,编订于西周初年,它以卦的形式表达了古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认识,它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尊其为群经之首,故又称《易经》,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巨著。

《易经》之“易”,有多种解释:一说,伏羲画八卦,“远取诸物”,“易”是鸟飞的象形;另一说,依据《说文解字》,“易”即蜴,是蜥蜴的象形,蜥蜴的保护色,随环境不断变化,以变化的含义,命名为易,来象征宇宙包罗万象的千变万化。《说文解字》又说,“易”是日月两个字组成,因而日代表阳,月代表阴,以象征易的阴阳二元论哲学。后汉人郑玄则说“易”这个字,有“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含义。而《周易》的“周”字,一说指周易为周人所作,一说指周密、周流、周遍之义。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由六十四个用象征符号表示的“卦”，与所附解说的“卦辞”、“爻辞”构成，六十四卦是由一与一两种称作“爻”的符号，由下而上顺序，以六画构成，乾坤二卦各多一爻。共计三百八十六爻。每卦之下，附有解说全卦的卦辞和爻辞，是每一卦的占断。经，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所有解释经的文字，称为“传”，共有十篇，计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十传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司马迁的推断依据是《论语·述而》篇中的孔子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一观点的可靠性不高，十传的论点，前后多有出入，甚至有所抵触，不可能是出自孔子一人的手笔，可能还包含孔子的弟子或后世的著作在内。

《周易》的内容广泛地体现了当时生产、生活的情况，诸如祭祀、战争、生产、婚姻等，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周易》是先秦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源头之一，同时，《周易》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近代西方创立微积分和二进位制数学也有重要启发。《周易》这本古老的奇书在今天仍以其玄妙和神秘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把《易经》的哲学思想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观物取象的观念。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万物生成的唯物主义观念。《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对后来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阳性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阴性这些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世界就是在两种对抗性的物质势力（阴阳）运动推移之下孳生、发展。

第二，万物交感的观念。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推动、矛盾中产生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交感。这一观念的形成，也可能由于男女交感产生子女的普遍现象概括出来的原则。

第三，发展变化的观念。变化发展的观念也是贯串在《易经》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易经》的作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变化着的事物有它发展的阶段。《易经》对每卦的每一爻都作出一般原则的说明。他们认为事物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下去，变化就深刻化、剧烈化，发展到最后阶段，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它就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事物本来是有前途的，过了它的极限，它反而没有前途了。这一物极必反的原则，因为它包含着辩证法的真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也得到更多人的相信。

以上是《易经》卦爻和卦爻辞的思想,易传部分的思想同样丰富。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把《易传》的思想,分为本体论、辩证法、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几个方面:

《易大传》是《周易》上下经的解说,它的解说不一定合乎《周易》古经的原意。但是《易大传》在解说古经时提出了若干关于宇宙人生的创造性见解,就思想的深度而论,可以说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水平。

《易大传》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辩证观点。《易大传》的辩证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最深刻的,对于后来辩证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易大传》辩证思想的最简要的命题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这些命题肯定了变化的普遍性永恒性,肯定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最根本的规律,并深刻地说明了变化的根源就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对立统一原理的最早表述。

《易大传》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以天人协调为最高理想,把扩充知识(“精义”),改进物质生活(“利用安身”)与提高品德(“崇德”)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易大传》认为,天的本性是健,人应该效法天的健。……健是刚强不屈的意思。人应该自强不息,永远努力前进。《易大传》的刚健学说和老子的守柔学说互相辉映,代表了当时哲学思想的高峰。

《易大传》对于后来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都从《易大传》中吸取思想营养。《易大传》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源头。在封建社会,它又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自从列为五经之一,便成为必读的教科书,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

这三百零五篇诗分风、雅、颂三类。

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桼》、《曹》、《豳》。又称“十五国风”。

雅:105篇,其中,《小雅》74篇,《大雅》31篇,又称“二雅”。

颂: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称“三颂”。

《诗经》总的时代是公元前11世纪至前5世纪,我国周代奴隶社会时期。其中,《周颂》最早,大多产生于西周前期,是庙堂祭祀乐歌。《大雅》次之,大多是西周中期的作品,一部分是西周后期的作品。《小雅》又次之,大多是西周后期的作品,少部分迟至东迁。二《雅》是朝会和贵族享宴乐歌。《鲁颂》、《商颂》、《国风》产生较晚,大多在春秋前半期,《鲁颂》是鲁国庙堂祭祀乐歌,《商颂》是宋国庙堂祭祀乐歌;《国风》一部分是民间诗歌,也有一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在民间流传的民歌中,是否有从很早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献不足,那就很难考定了。以上是就总体而言,《周颂》与《大雅》产生的时代以及《小雅》与《国风》产生的时代不能截然分开,我们也无法一一考证三百篇各篇产生的具体年代,只是就各类诗的内容和特点,大体上看出它们产生的历史阶段。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当作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教科书。因此,在封建社会,《诗经》研究以经学为主体,以宣扬儒家教义为主要内容,这就不能不严重地掩盖《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经学经过几次重大的变革,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所变化。在各个学派的论争中,新起的学派为了驳倒旧的学派,最初也以一定的求实精神,对《诗经》的某些方面,作出一些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解释,积累了一些不无可取的训诂、考证等材料。按照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这条主线,可以把《诗经》研究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孔子整理三百篇,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材,倡导儒家诗教。他说《诗》,采取触类旁通、断章取义的方法来贯彻他的“仁”、“礼”学说。孟子继承并且发展了这种思想和方法,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论。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和方法,进而创立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学术文化)观。这些,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汉代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后《毛诗》独传,《毛传》体现了古文经学的成果。郑玄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集东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大成,为《毛传》作笺,完成了划时代的《毛诗传笺》。唐初孔颖达又采六朝以来《诗经》注疏的可取之说,为《毛诗传笺》作疏而成《毛诗正义》,统一汉学各派的斗争。在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

理论批评发展之际,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总结《诗经》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展开废序与尊序的论争。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注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证的成果,又比较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这部注说直到清代仍是权威性的注本。元、明是宋学的继续。明代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有一些成绩。宋、明诗话对《诗经》的艺术也有一些探讨。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桎梏,提倡复兴汉学,兴起新汉学。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清今文学派则致力于搜辑三家诗遗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郑玄《毛诗传笺》为本,吸取清代考据学成果,着重纠毛、郑和孔疏的错误,也吸取今文可取疏解,是清代今古文通学的代表作。陈奂《诗毛氏传疏》力主古文《毛诗》,是清代研究《毛诗》的集大成著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著作。魏源《诗古微》是清今文《诗经》学的代表作。另外,姚际恒、崔述、方玉润属独立思考派,以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作。在清人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也较有价值。

(五)“五四”以后时期。早在旧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就开始以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五四”运动猛烈地扫荡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批判封建经学,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起过战斗作用。古史辨派对揭示《诗经》的真相,作出积极的贡献。30年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诗经》研究,郭沫若倡导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下把《诗经》应用于古代社会研究,并且是《诗经》今译(译为新诗)的创始人。30和40年代闻一多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当代也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和《诗经》全译本多种。

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和研究流派的研究;第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第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第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有关研究资料的研究。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它的内容既有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的诗歌,也有反剥削、反压迫的诗歌;既有反映贵族生活和歌颂王公贵族的诗,也有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刺诗;既有抒写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诗,也有叙述

周人开国和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诗。可以说《诗经》是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中叶的发展史。

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诗经》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具有丰富的词汇,尤其在研究上古音韵方面,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诗经》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这可能受原始劳动诗歌一反一复的制约。但到诗人情绪激昂时,也会突破常用的句式,有从一字到八字的变化。《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和谐悦耳的。在声调方面,有双声、叠韵、复句之妙,有顶真、排比之变,有兮、矣、只、思、斯、也之声。这些,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在用韵方面,也是比较复杂而又自由的,音节铿锵,和谐优美。

总之,《诗经》在写作技巧上,遣词用字精练生动,句法章法变化无穷,状物写人形象逼真,叙事抒情优美感人,是一部文学和历史的艺术珍品。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是主要讲述“礼”的书。礼的产生非常早,夏商两代都已有了各自的礼。到了周代,为了限制诸侯僭越,以下犯上,更制定了详尽的礼法,上自典章制度,宗教仪式,下至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无不包罗。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以,后世所说的礼,指的就是周代的礼。入十三经还有两部礼书,即《周礼》和《仪礼》。它们和《礼记》合称“三礼”。

《礼记》是西汉今文经学家戴圣所编纂。戴圣,生卒不详,字次君,梁国人,礼学博士,从《汉书》和《后汉书》的简略记载推知,大约是武帝、宣帝时人。

西汉时立于学官的“五经”中的《礼》,本是指《仪礼》十七篇而言。《礼记》只是关于《礼》的“记”。也就是说,《礼记》是解释、说明《礼》的,而非经本身。自从东汉学者郑玄为《礼记》作注后,其地位便逐渐上升。到了唐代,已与《周礼》、《仪礼》并列进入“九经”之中了。

关于《礼记》的成书,依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西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孔门弟子和后学者关于礼学的著作共一百三十一篇。西汉晚期,刘向考校整理经籍,于上述书中检得一百三十篇,又检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重复的部分,将其合而辑之为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礼》。戴圣又将《大戴礼》加以删节整理为四十六篇,这就是《小戴礼》。东汉末年,马融传《小戴礼》又增补了《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共四十九篇,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礼记》。